



编者按

当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忠县这片浸润着忠文化的土地，以独特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抗战篇章。作为川东抗战的重要节点，忠县虽未直接遭遇日军铁蹄践踏，却始终后方支援的坚固堡垒。无数忠县子弟穿上军装奔赴前线，用生命践行“忠”之大义；后方民众节衣缩食、捐钱献物，以涓滴之力汇聚成抗战的磅礴伟力。烽火中，忠县的街巷里回荡着救亡的呐喊，田野间生长着不屈的希望。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即日起，本报推出抗战特别报道，带领读者走进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探寻忠州大地上镌刻的抗战足迹，感受忠州儿女熔铸的家国情怀，让这份跨越时空的忠义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抗日救亡中的忠州儿女（一）

□袁代奎（作者系忠县政协退休干部）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忠州儿女秉承精忠报国之志，发扬巴蔓子、严颜、秦良玉毁家纾难、忠贞为国的精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投身抗日救亡大业。

一、踊跃参军的忠州青年

九·一八事变以来，忠县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忠县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驱逐倭奴，还我河山”“誓死抗日”等大幅标语悬挂县城街头；各中小学师生纷纷走上街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日本人来了》等新剧；教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打倒日本除汉奸》等抗日歌曲；编写宣传提纲，组织师生下乡宣传，散发《告民众书》，以唤醒民众，共赴国难。商界人士掀起“抵制日货，拒销日货”等运动。组织县城青年、公教人员操练“义勇军”；组织“俭德救国会”，继承“禹墨精神”，储金救国。设置防空监视哨所，发动挖掘防空壕、洞，县城共挖掘防空洞32个。成立忠县賑济会，救济、安置因日寇侵略而流离失所的沦陷区难民近800名。

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县筹款汇到上海慰劳军队，支援第十九路军将士抗战。随后，忠县成立“忠县抗日动员会”“抗日救亡后援会”“忠县防奸护民团”“忠县慰劳伤兵委员会”，发动书写信函，慰问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全县人民脱簪解佩、倾囊慨捐，踊跃捐献现金和募集寒衣，送到前线支援抗战。1937年12月，陆军102后方医院迁驻忠县城（1945年4月撤离），8年中，忠县各团体和各界人士，多次前往医院慰问为国为民流血负伤的官兵，仅1938年、1939年两年，捐赠草席500床、棉被1500床、棉背心500件、毛巾若干条，以及肥猪、粮食等物。每年暑假组建宣传队，前往医院为伤兵演出文艺节目。

忠县有志男儿踊跃从军抗战，抗战时期，忠县应征开赴前线的壮丁多达4.1万人。莫高喧《莫氏新族谱》记载，抗战时期，枳山区莫姓子弟85人，莫定伦的3个儿子莫肇田、肇春、肇瑜同时从戎，莫文魁和莫文当、莫肇兴和莫肇秀、莫定炳和莫定杰等3对兄弟同时参军抗战。鉴于中国远征军急需补充兵源的形式，1943年11月，四川省军管区广泛宣传青年从军运动，号召各地青年积极从军。忠县精忠中学制定了《奖励志愿从军补充办法》十一条，主要之点有“从军旅费1万元、保留学籍与期考成绩今后可免考毕业、退伍后可返校继续学习、校友服役期间学校督促省县府对其家属切实予以优待、热烈欢送并修纪念碑以资表扬而永垂不朽”等。张贴鼓励学生参军的文告：“学生志愿服役，各地风起云涌。我校学生，素不后人，躬身倡导，慨然应征，激扬士气，振奋人心。尝胆卧薪，共筹恢复之策；枕戈待旦，大张挞伐之师。鲁仲连义不帝秦，甘心蹈海；祖士雅志存兴晋，击楫渡江。堂堂大国，不乏杀身之节；济济一堂，岂无爱国男儿。近来寇气复炽，国兽犹犬；动全国之师，作孤注之掷。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大敌当前，更堪发指！诸生当憬国难之严重，弥觉责任之匪轻。主奴荣辱，争此须臾；国家存亡，介在毫发！更应激发天良，洞明大道。先民而犯难，后人而安食。慷慨从戎，请从隗始，驱驰就道，愿着鞭先……读圣贤书，所学何事？难其义尽，斯乃仁至。国难未纾，我躬恤恤；奋为先登，义无反顾；妣美前贤，立功当代。陷阵冲锋，争取抗战之胜利；图存御侮，发扬民族之光辉。”这篇鼓舞学生参军抗日的檄文，激发了全校师生的参军热情。当时300多名学生中，适龄（16岁以上）学生90名，秦清波、杨华、石明银、胡地贵（又名胡友直）等28人奋勇争先自请入伍，占适龄学生比例31%。为此，忠县精忠初级中学（今忠县中学）于校园内立“精忠中学抗战学生纪念碑”，碑面铭刻着28位从戎学生的姓名，上镌“精忠报国”4个大字，两旁刻着赞扬他们的楹联：学校是红炉已铸成几许英才如钢如铁，神州如沸鼎鼎尽杀战争狂贼同泽同袍。纪念碑至今屹立校园，碑上一个个投笔从戎学生的英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忠县县立中学、忠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忠县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忠县县立初级中学、忠县私立大道中学等全县9所学校56名青年师生投笔从戎，其中女生16名，特别是忠县三江乡中心国民学校教务主任谢静波和教员秦光琼夫妇双双从军。1945年1月4日，由县国民兵团派员护送入伍这84名忠州儿女赴綦江基地接受军事、政治教育和训练，训练科目由兵器到战术，学科、术科及思想并重。训练期限为3个月，结束后补充远征军出国参战，青年军先后参加了缅北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戍诸战役，对打通中印公路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胜利后，成善享、刘建泗等多数人退伍复员、复学，从事教育、医务等工作。

二、喋血沙场的忠县勇士

忠县从军的优秀儿女，驰骋沙场，以低劣的武器装备、用血肉之躯与拥有现代化武

器的日军对决。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奋勇杀敌，建功立业，不少人血洒疆场，慷慨成仁。他们发扬巴蔓子、严颜、秦良玉毁家纾难、忠贞为国的精神，用血肉之躯对决日军的现代化武器。有13位忠县籍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国民革命军将领：最著名的是第18军中将军长、抗日名将罗广文，还有第30集团军少将参谋长何治安，军需学校学员班少将总队长张仰虞，122师少将参谋长刘永庆，中国驻缅甸远征军工兵指挥官申承基，少将副师长冯济安，重庆卫戍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冯家邦，军政治处少将主任李宗伯，少将师长陈止戈，少将骑兵师长周成浩，少将师长马德尊，炮兵战车防御炮团少将团长周雨寰，炮兵少将团长申英模。他们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生活在今天和平世界的我们应该记得他们。

抗战时期，川军参战人数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伤亡64万多人，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民国《忠县志》载：“忠县自抗战以来，截至1945年止，出征士兵计39183名，阵亡或病歿者当不乏人。惜县无真确统计，无法采访，仅就优待委员会清册造表，1941年至1944年底计殉国阵亡及因病病歿士兵325名。按伤、亡比例推之，伤者当在万人以上。”据忠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调研统计，在抗战中殉国阵亡忠县籍官兵1345名，其中军官有上校团长谢北亭，中校营长郭寿极、炮兵少校连长沈鸿、上尉连长胡辉武，中尉周群、少尉袁家凡和刘柏芳等多人。

谢北亭（1900～1937）本名谢效鑫，忠县三汇人。少年时好勇勤学，18岁从军，在四川军阀部队历官排、连、营、副团长，26师155团团长，驻守贵州独山、独山一带。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10月中旬，26师奉令增援，18日赶到上海，立即开赴大场前线，以十分低劣的武器装备担负马桥宅附近地带的防守。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的猛烈攻击下，阵地成了一片焦土，官兵伤亡惨重，尸体横陈，残肢断臂在竹林、树梢随处挂着，惨不忍睹。但全团官兵同仇敌忾，英勇战斗，宁死不当亡国奴，重伤也坚持不下火线。激战三日，防御工事被摧毁殆尽，官兵伤亡过半，谢北亭和剩下的官兵用尸体垒成掩体阻击敌人。一旦日寇接近，即跳出掩体，端起刺刀，展开白刃战杀退敌人，顽强坚守阵地。血战七昼夜，26师4000多名官兵，仅剩600人，谢北亭亦中弹壮烈牺牲。

郭寿极（1907～1942）忠县黄龙人，历任国民革命军21军警备师手枪营副营长、当阳城防司令、148师44团四营营长等职。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川军出川抗战，他编任国军陈鸣谦部连长，参加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后，转入第三战区，在安徽繁昌、铜陵、南陵、贵池、东流和江西鄱阳、湖口等地与日寇连续作战50多次。江窑战斗中，他率部抵御3倍于己之敌。日寇用密集的炮火，将我阵地炸成一片焦土，郭连伤亡50余人，他自己也胸部中弹，鲜血染红了军衣。他大声激励士兵们：“男子汉大丈夫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把最后的气力使出来吧！”跳出战壕，端起机枪向冲上来的日兵猛扫。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坚守阵地三昼夜。荣获海陆空三军乙等奖，晋升为营长。1942年3月郭寿极率部到澄江团接手第一营防务。汉奸侦知部队换防，趁新到部队情况不明备战不足之机，带领日寇连夜奔袭。郭寿极匆忙应战，率兵奋勇抵抗，与日兵展开肉搏，手刃数人，自己伤创多处，鲜血淋漓，力尽被俘。日军官令汉奸投降，郭寿极大骂汉奸，以血怒唾其面。日军官亲自向降，郭寿极厉声说：“我中华民族，自古有断头将军，无投降将军。今天是我效先贤为国尽忠的日子，要杀便杀，不必多言。”敌再劝，郭寿极以脚踏地，痛斥日寇，于是殉国。其妻林氏，时探亲随军，同陷敌营，见丈夫以身殉国，当即吞金戒指自尽。亦女中之节烈者。舍生取义，忠勇节烈，夫妇二人可共生辉，惜子女俱无。

沈士鸿（1915～1939）亦名沈鸿，忠县花桥人，于忠县县立中学毕业后，留日攻读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值中日战起，投身国军中华队三十四队炮兵科，往来齐鲁、江浙之间，作战有功，升炮兵第一旅一中营一连少校连长，在战斗中多次与敌人通信，誓言奋勇杀敌，以身报国。后将他的书籍、文件、衣服，全部寄回家里以作纪念。湘北第一次战役，督守洞庭湖营田要隘，首当寇冲。敌由湖口水陆猛攻，连全兵士伤亡殆尽，沈鸿犹力战不退。已而身受重伤，抬往长沙医院抢救无效，含恨殉国。葬长沙浏阳

门外五里牌。年仅二十有四，壮哉！

胡辉武（？～1939）忠县马灌人。17岁投川军孙震部，1939年冬出川参加随枣会战，任第22集团军41军上尉连长，12月在湖北钟祥县与敌人鏖战，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舍生取义，以身殉国。

三、心红志坚的共产党人

田云书（1896～1980）忠县金鸡人。1933年在云南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战士、班长、排长等职。参加过泸定桥、天全、泸山、孟永、平型关等21次重要战役和战斗，英勇善战，负伤5次，为抗日救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荣获人民功臣、独立自由、解放等奖章和纪念章。1956年退伍在荣疗疗养，回县定居，保持革命晚节，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到学校给师生们讲革命斗争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秦仪贞（1889～1966），又名毅贞、贞贞。出生于忠县石宝镇韶江家庭。孩提时随父兄往来于重庆、汉口之间，父亲得了肺病，无钱医治而去世。7岁的秦仪贞和母亲只得随哥哥漂泊到夔州，没过多久，母亲和哥哥也相继亡故。孤苦伶仃的她，多亏父兄那些船工朋友们接济，才活了下来。她12岁时来到汉口，投奔经营中外大药房的义父钟繁堂，在钟家长大成人。由钟繁堂夫妇作主，16岁时同老成持重的店员、浙江宁波人杜善康结婚。1910年钟繁堂派他俩到兰州筹办分店。他们到兰州后在道升巷69号租用巷口“兴文社”3间铺面开办了“兰州中外大药房”，销售药品。药房生意兴隆，经过十多年打拼，远近闻名，杜太太、杜老板成了当地名人。1926年春，秦仪贞由中共甘肃特派委员钱峭泉和王陶（江苏南通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甘肃第一位女党员，在特支的领导下，以兰州中外大药房女老板的社会身份和以治盐生意、药品采购为名，从事交通联络及后勤工作。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初，与化装成鄂商的王陶、张一悟等30多名同志一行赴上海。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秦仪贞继续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她开了家德胜皮鞋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英勇机智地完成各项任务。1931年1月何孟雄、林育南等30多位党的重要干部被捕，秦仪贞积极投入营救工作，变卖金银首饰，作为营救经费。这些同志被敌人杀害后，她慷慨解囊，拿出数百元抚恤烈士亲属。淞沪会战中，她投身参加上海人民支援第九路军的活动，捐助、募集大量药品支持抗日将士。她的德胜皮鞋店被日机炸毁，迁居同孚路长风里23号，继续为党工作。

1934年秋，经党组织同意，秦仪贞重返兰州，途经西安时，她从“老德记”药房躲到一批药材带回兰州，一边经营、振兴兰州中外大药房，一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7年12月，日寇占领济南，在济南狱中关押5年多、饱受摧残致病的张一悟趁城中大乱之机，逃出魔窟，辗转回到兰州，经中共甘肃工委批准，与秦仪贞单线联系。秦仪贞以给孩子聘请家庭教师为名，让张一悟住进西园街70号家中，为他申报了户口，休养治疗和从事革命活动。为保证张一悟的安全，必须经常更换其住所，秦仪贞总是亲自调查周围的环境、人员情况，事先做好安全部署。十年间，尽管张一悟遭到敌人的追捕、通缉，生命几度垂危，但在秦仪贞和同志们的精心保护和照顾下，一直安然无恙。秦仪贞这种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全力投入革命事业的精神赢得战友们的敬仰，与战友们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抗战时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后，秦仪贞全力协助“八办”积极开展接待、服务、安全保障等工作。我党许多重要干部往返苏联途经兰州就住在这里，所需药品多由兰州中外大药房供给。1938年冬，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刘亚楼、校务部部长杨至成等7位同志赴苏联途经兰州时，急需用药，秦仪贞立即送去。“八办”党中央代表谢觉哉的女儿谢安身患伤寒，高烧不退，幸赖张一悟处方、秦仪贞供药得以转危为安。为帮助病弱的南方籍同志尽快恢复健康，秦仪贞亲自买来大米送去办事处。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兰州当局对“八办”实行经济封锁，不准粮商向办事处售粮。在张一悟的指示下，秦仪贞出面到榆中县粮商石贤德做工作，由石售粮给“八办”。她利用各种关系，协助“八办”买药品，搞情报，多次掩护革命同志；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资助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缺乏路费进步青年。解放后，她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赢得群众的称赞和敬重。先后

当选为兰州市党代会代表、兰州市人民代表，甘肃省人民代表、省妇联执委和政协二、三届委员。她还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爱国卫生、群众文化教育等活动中，积极带头作为，赢得群众的广泛称赞。《甘肃农民报》、省人民广播电台宣传过她的革命活动事迹，兰州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她的新闻短片；许多机关单位和中小学校，多次请她作报告；兰州市教育局以《革命的老妈妈——秦仪贞》为题，把她的事迹编入教学参考教材。她那传奇光辉的一生，再次生动说明“忠州女子天下奇”，为忠文化添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0年，冯玉祥将军尊称为“秦良玉第二”的**秦德君**（1905～1999）从日本回国，10月辗转重庆，寄居在临江门的姑母家养病。姑母之子熊佛田思想进步，是重庆有名的“红色律师”。见她久病不愈，“四川王”刘湘第21军司令部秘书、远房堂兄秦仲高接她住家中治疗休养，1933年向秘书长刘庸彝推荐、刘湘任命秦德君为“参议官”。秦德君思付红军来到西秀黔彭，将军和地方军的前后夹击，命运难以预料，自己虽与党失去联系，是一只失群的孤雁，但仍是白皮红心、“情系共产党”的雁，仍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只要能帮助共产党、帮助红军，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便同意就任“参议官”，以此作掩护，尽心尽力帮助共产党、帮助红军。刘湘的心腹干将、西秀黔彭“剿赤总司令”王心卫狂热地追求她，她以“不剿红军”为条件而答应结婚。1936年11月，刘湘邀请曾任实业部政务次长、著名国民党左派郭春涛任川康绥靖公署秘书长，秦德君与他不期而遇，早在1925年他们在冯玉祥部时就熟识友好。卢沟桥事变后，郭春涛、秦德君积极策动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日，郭春涛为刘湘起草电文呈蒋介石“请缨抗日”和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成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举行川军出川抗日誓师大会。秦德君想设法寻找上前线杀敌的机会，成都《华西日报》第一版曾发表消息“秦德君请缨杀敌”。9月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10月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岌岌可危。蒋介石急调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率领川军驻守南京，郭春涛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部阵地委员会主席，随军出征参加南京保卫战。蒋介石下令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放弃南京。用大批舰船抢运小轿车，郭春涛大怒，下令将装舰的小轿车推入江中，优先抢运难民，救下2万多名百姓。1937年12月，郭春涛撤离南京时，翻车坠崖受伤，伤好后来到重庆。此时，周恩来为驻重庆代表团团长，他与周恩来取得联系，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刘湘死后，秦德君谢绝了刘夫人叫她“办遗属学校”的建议，打定主意赴延安，重回党的怀抱，带着女儿秋燕，弃家离开王心卫。与郭春涛重逢后，郭春涛护送她母女到达延安，她再赴苏联学习军事，回来参加抗战救国国家。但周恩来挽留她在重庆配合中共党组织从事民主活动，郭也希望秦德君留下帮助自己工作，秦德君被郭说服，留下成为其助手。由于志同道合，接触频繁，不久擦出爱情的火花，是时王心卫已在成都病逝。33岁的秦德君同40岁的郭春涛结婚，从此他俩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并肩走在千难万险的革命道路上。后来，秦德君帮助李正清、莫延年等忠县籍青年学生，由丈夫郭春涛写信给周恩来和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

1938年冬，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以秦德君家为据点，与董必武、杨杰、杨虎、张澜、陈铭枢、章伯钧、姚觉吾、郭春涛组成九人小组，经常秘密集会，谋划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开展联合抗日斗争。1939年，根据周恩来指示，郭春涛、秦德君夫妇与中共派往重庆的秘密代表王炳南组建“东方文化协会”，由王炳南出面联系请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会长，郭春涛出任联系请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为副会长，郭春涛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王炳南、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为常务理事。协会成员还有日本反战同盟的青山和夫、鹿地亘、绿川英子、田田幸子，越南、印度、泰国代表以及中国台湾代表谢南光等。该协会的宗旨就是把国内外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秦德君穿着貂皮大衣，在重庆上流社会俨然一位社交名媛，从事着极为危险的统战、情报工作。东方文化协会通过合法的文化活动，参与和沟通各种形式的国际抗日活动，协助中共工作。他们把有关方面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和日本反战同盟代表中获得的日军大本营的动向、日德之间的外交密电，以及被俘日军高级将领的口供、截获日军的电文等重要情报，经过分析整理

后，通过王炳南及时转告中共中央。为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情报，作出了贡献。

1940年，周恩来介绍苏联大使馆武官（后来任大使）罗申找郭春涛，请郭春涛、秦德君帮助他了解中国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各党派、各阶层的一些动态。1941年秦德君经张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出任民盟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与妇女文化公司总经理兼常务董事、民盟中央常务监察委员，为抗战朝夕奔走。1945年7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的支持与领导下，重庆成立由李德全任理事长、刘清扬任秘书长的“中国妇女联谊会”。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到重庆和谈期间，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亲切接见秦德君等“中国妇联”负责人，肯定了她对抗战的贡献。

马识途（1915～2024）原名马千木，1915年出生于忠县坪山坝一书香门第，12岁入读忠县东区中学，当时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中共党员吴逸僧、牟汤铭等受党组织的安排回家乡，成立忠县东山区区委，到东区中学做教员，在师生中宣传共产党主张，马千木受到了革命理论的启蒙。1928年，他考入忠县县立初级中学，1931年毕业远赴北平大学附中读高中。九·一八事变后，他跟着高年级同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募捐，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1933年日军侵入北平、天津，他转到上海，进入浦东中学读高二，1936年毕业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放弃工业救国的幻想，参加秘密学联小组，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他和刘惠馨等同学组成一个农村服务团，到郊区去做抗日宣传工作。南京沦陷前夕，他们到武汉经党组织介绍，董必武同志那里，董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写信介绍他们到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中共湖北省工委组织部办的党训班，第一次较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的他俩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并结婚。1938年3月，经湖北省委书记部部长钱瑛介绍加入共产党，改名“马识途”，从此投身中国革命，迎着腥风血雨、刀从剑树，走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最前沿。先后担任武汉工人组织“蚁社”党支部书记、襄阳县县委书记、鄂北特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1940年8月南方局派湘鄂西省委负责人何功伟任鄂西特委书记，他改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刘惠馨任特委书记，郭春涛任副书记，刘惠馨任特委书记，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长官部都在恩施，统由陈诚负责，恩施成了湖北省的政治中心，在这种环境里从事地下工作，其艰险可想而知。他们迎着困难战斗，在工人、农民、教师和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发展党组织；同时与一些高级官吏打交道，做统战工作。同年10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鄂西一片白色恐怖。马识途将叛徒认识且临产的何功伟之妻、共产党员许云，转移到忠县坪山坝老家中隐蔽待产。由于叛徒出卖，1941年1月2日何功伟和月子中的刘惠馨不幸被捕，在狱中备受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年11月17日壮烈牺牲，不满周岁的女儿下落不明。马识途时在利川巡视工作而幸免。他到重庆南方局汇报鄂西党组织被破坏情况，南方局决定他不返回鄂西，到老家接出许云母子。他不辱使命将他们接到重庆，南方局派人将母子安全送到延安。1941年秋，按照党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马识途转移到云南昆明，将高中毕业证书上的“木”字添加一撇改名为“马千木”，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先后在中文系、外文系学习4年，担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领导同学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美国陈纳德将军组建的大本营设在昆明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因在与日本空军的战斗中战果辉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飞虎队”。马识途和同学们对飞虎队非常佩服，1944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他到昆明南屏街去逛书店翻看英文书，结识了两名飞虎队队员。他带领他们到了一个小茶馆，边喝茶边交谈，向他们大致介绍了华北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情况，他们很感兴趣，希望知道更多细节，于是又把他們带到离书店不远的正在联大外语系学习的何功楷住处。他们交谈了一阵，都意犹未尽，约好一个星期后再面谈。马和何功楷又找了英语比较好的张彦、许乃炯等五六个同学给飞虎队当义务翻译，向他们介绍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情况。从那以后近两年的时间里，马识途和几名同学与飞虎队队员贝尔、海曼、埃德曼等人相识，成为朋友。双方每两周在公园聚会一次，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从未中断。基本上每两周都会找地方聚会，甚至后来还发展到邀他们去美军军营介绍华北抗战情况。马与飞虎队队员结下深厚友谊，并有力地宣传了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和政治主张。

（未完待续）